

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基本認識

郭仁孚*

- 一、前言
- 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
- 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性質
- 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
- 五、結語

本文所欲介紹者為政治理論中最早與最久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本文對此類理論之介紹，只限於其意義、性質與目的三基本方面。本文對這三基本面的介紹，都是根據作者認為最適當與最合理因而才選擇的當代研究該類理論學者的詮釋。

政治理論之所以被稱為「經典」，不僅因為它們在洞察的深度，概念的明晰，想像的新鮮，及思考的邏輯上被公認為具有一流的水準；而且更因為它們能不斷激發後人的心智，從中得到解決各自所處時代政治困境的答案的最佳起點，故其價值永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不同時代的經典政治理論家之間，存有一種對話的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含有持續性的議題，更含有討論議題的持續方式。於是各時代參與對話者都難免受到傳統的用語，概念，規則及慣例的約束而必須遵守之。當然後來者亦可在不推翻整個傳統的前提之下，對傳統上的錯誤有所改正，使傳統更新而得以不斷的延續其生命。

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它們在寫作意圖上的道德性；在內容範圍上的廣包性；在思考程序上的哲學性；及在著作相關上的普遍性。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身上，我們也發現他們超越時空的開放態度；了解真象的企圖心；以普遍及永恆的問題為焦點；淡化典範的現實主義；承認知識有限度的謙虛態度；及知識上的誠實無欺。

比較言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在目的上，一方面不同於意識形態，因為它們擺脫並超越特定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它們既不是純粹的科學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政治理論（其目的在敘述與解釋公民與國家的實際政治行為），也不是純粹的哲學政治理論（其目的在建議公民與國家應追求的目標與應遵守的一般行為規則），而是兩者的結合；至於孰輕孰重，則因人而異。單獨來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任務在提供關於人類政治生活深刻及全面的看法（同時是一種敘述與評價），以糾正大多數人看政治的近視或錯覺，使他們看得更廣，更遠及更清楚，以避免近視或錯覺所帶來的政治災難。不管是從比較或單一的角度看，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都在追求一共同的最後目的：去認識及說明甚麼使政治社會成為良好的社會。

關鍵詞：經典、傳統、理論、政治理論：意義、性質與目的、看法

一、前言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是政治理論中最早也最久的一種，任何認識政治理論全貌的企圖都必須以此為起點。認識政治理論的全貌固然困難，單只認識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亦非易事。不僅各時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自己的原著，經過世代的累積，其總數已是數量可觀；而且很多後世詮釋者對原著的詮釋，更是多得勝枚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原著需要經過詮釋者加以詮釋後才易於被了解，但是不同詮釋者所產生互相衝突的詮釋又常令人無所適從，反而增加了解原著的難度。這正是認識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所遭遇到的兩難之所在。

傑姆斯（Elizabeth M. James）教授對上述兩難有進一步的說明。首先她指出學生或讀者在閱讀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時，一定會被各種不同的關於理論與理論家的詮釋性著作所衝擊與迷惑；因為對於任何主要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作品的詮釋，都包含對所探討作者及其作品的意義極端不同而常相衝突的見

解，以致同樣的題材在不同學者之間必然引起不同的詮釋。（James：1）既然如此，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何必加以詮釋呢？在傑姆斯看來，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加以詮釋實有其必要，她所持的理由有二。第一，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並非應用嚴格意義的科學理論；雖然和科學理論一樣，它也敘述及分析甚麼是並且試圖預測甚麼將是；但是它們的敘述與預述不像科學的敘述與預測，能在精確觀察的實驗中加以證實或否定。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可說是超越科學理論的理論，它超越科學的敘述與預測而具有批判及建設的功能；換言之，它也批評甚麼是及建構甚麼應該是，這種批判及建設的功能使它是以價值為基礎的活動；對於這種活動，用許多觀點來加以詮釋是有助益的。（

James：2）第二，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的一切敘述、預測、批評及建構都是用作者生活時期不精確的語言加以說明；此外，作者的思想難免不受其個人的人格與其所屬社會的文化的影響。在科學理論中，語言的不精確性及人格與文化的影響固然是負數；但在傳統經典的政治理論中，它們反而是觸動詮釋的板機，有助於新鮮及創造性政治想像力的發展。（James：2）因此，在傑姆斯看來，偉大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就好像偉大的藝術作品一樣，乃是人類複雜意義的反映，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們時，它們會有不同的意義。尤其當我們透過理論家本人以外他人的各種不同意識為媒介，去了解理論家本人的意識時，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所含藏的豐富意識更充分表達無遺了。（James：2）

就傑姆斯而言，詮釋就是“對意義的尋求”。詮釋者透過何種詮釋方式以尋求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所含的真正意義呢？傑氏所敘述及檢討的詮釋方式包括下列幾種。第一，有些詮釋者單純透過對原作品作嚴密的文字分析以尋找作者本人的意圖。此種透過文字分析以尋求意義的方式很多；或考慮所選擇文字的定義及含意，或檢視文句所在的段落、章節及全文的脈絡；或把某篇論文視為作者終身全部著作的一部份而加以檢討；或對翻譯原著的現代譯著加以透視；或根據寫作的形式及格調以分析作品；或逐行分析文句等。

（James：19-29）第二，有些詮釋者透過對原作者本人傳記的研究以了解作

者寫作的意圖。對原作者傳記的研究包括作者的出身地、旅遊地、產業、朋友、愛情及職業等。把作者的傳記和作者的作品連接在一起，至少能了解作者寫作的個人背景，從而幫助我們了解作者寫作的動機。（James：30-39）第三，有些詮釋者透過應用心理學及精神病學的方法以研究作者寫作的心路歷程，藉以了解作者寫作的意圖。（James：39-43）第四，有些詮釋者透過對作者所處時空大環境的研究以了解促進或限制其思想的根源，從而幫助我們了解其思想產品在意識形態上的含意。（James：44-63）第五，有些詮釋者懷疑作者的意圖及作品的含意對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有何相干及有何用途。因此他們既不從作者的意圖，也不從作品的含意，乃從作品對實際政治的影響及後果去尋找政治理論的真正意義。他們把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看成是其後政治事件或政治體系的原因，並且根據個人的政治偏好加以讚揚或譴責。（James：4, 64-74）

本文的目的既不在詳細介紹，也不在實際應用傑姆斯所發現的各種不同詮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方式，而在藉以說明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難處，因為傑姆斯本人對所涉及的困難最清楚不過。其實當她在介紹每一種詮釋方式時，一方面固然津津樂道其優點或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忘提醒我們注意其缺點或限度。更重要的是，她更不只一次明示詮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替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者所帶來的難題。第一，就閱讀或判斷詮釋者的作品的人而言，他們常發現詮釋者並未明示採取那種詮釋方式，因此讀者並不清楚詮釋者關於政治及知識性質的基本假定是甚麼。同時詮釋者常隱藏其目的，以致讀者不知道詮釋者所追求的詮釋目的究竟是甚麼：作者的意圖？理論的不同含意？或理論與政治事件的因果關係？此外，讀者也不清楚詮釋者所偏好的詮釋方式究竟是那一種：文獻分析？傳記研究？心理分析？歷史探討？或意識形態追究？（James：7）第二，讀者會誤以為大多數詮釋者只採用一種詮釋方式，或誤以為任何一位詮釋者在其詮釋性作品中都採用同一的詮釋方式。（James：17）事實上，傑姆斯之區分不同的詮釋方式，並加以個別詳細的討論，只是為了便於證明及瞭解起見的「人為分類」，並不是因為不

同的詮釋者分別採取不同的詮釋方式的「自然分類」。(James: 75)換言之，詮釋者在實際上採取詮釋方式時，常混合各種方式而未予區分。第三，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詮釋的分歧，不僅由於詮釋者採取不同的詮釋方式；不僅由於詮釋者對理論的意義有不同的看法；也由於詮釋者對政治理論的目的，對甚麼構成對理論的了解，以及對理論家在政治中的角色，都各有不同的看法。(James: 76-80)

作者在本文不擬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原著去認識它的各方面，只打算依賴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對它的詮釋。作者的工作表面上看，既省時又省事，輕而易舉；其實並不盡然。作者在尋找適合本文所需要的詮釋者的過程中，曾飽嘗浪費許多時間卻遍尋不著之苦。本文對詮釋者的選擇當然是作者個人的選擇，代表作者個人在相關方面與詮釋者的同感。作者之尋找與選擇詮釋者當然沒有任何創見可言，但若能因此而在認識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最重要的各方面對教學有所貢獻，則於願已足，不枉辛苦一場。

在作者個人看來，傳統經典的政治理論最重要的各方面至少包括：它的意義、性質與目的；它形成的動態歷程，以及它在結論上的主要內容。本文首先從它的意義，性質與目的著手，故本文除前言及結語外，共分三章：第一章旨在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第二章旨在認識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性質；第三章旨在明瞭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

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

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中，「理論」一字常和「實踐」一字對照；後者指具體的行動，前者則指抽象的思想。然而思想也是一種活動，只不過不是看得見的體力活動，而是看不見的智慧活動。按英文“theory”一字乃根源於希臘字“Theorein”，後者意指「觀望、看見、思考」。(Spragens: 1)受其字源影響，時至今日，理論不僅指思想的結果，也指思想的過程，完整意義的理論應該包括兩者在內。

雖然理論就是思想，但是政治理論並不等於政治思想，因為思想有不同的層次，政治理論屬於高層次的政治思想。已故當代研究政治思想的權威學者史特勞斯（Leo Strauss）教授，把高層次的政治思想稱為政治哲學，以別於低層次的一般政治思想。在他看來，一般的政治思想就是關於政治基本原則的普通意見或信仰；但是政治哲學則是特意不斷努力用關於政治基本原則的知識取代關於政治基本原則的意見或信仰。因此，史氏認為一切的政治哲學都是政治思想；但並非一切的政治思想都是政治哲學。一般政治思想家的興趣在於特定的政治秩序或政策；政治哲學家的興趣則在於普遍的政治真理。一般政治思想可以表達於公開演說，或法律條文，甚至詩歌或故事之中；但是政治哲學則只能表達於嚴謹的論文之中。（Strauss：12）

另一位當代研究政治思想的名學者傑米羅（Dante Germino）對此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凡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人都會發現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家：絕大多數的政治思想家只關心眼前的實際政治問題，把一切基本的政治原則都視為當然而置之不理，他們常隨興信筆撰寫批評時政的政治短文，但從不嚴肅認真有系統的撰寫關於永久問題的政治專論；但是也有極少數政治思想家關心超越時空的永恆及普通的政治問題，他們留下了值得後代子孫一讀再讀的不朽政治巨著。傑米羅稱第一種政治思想家為「政論家」（Political publicists），稱第二種政治思想家為「政治理論家」（political theorists）；前者的作品只是政治教義或教條，後者的作品才是政治理論（Germino, 1967：13-14）

政治理論家留給後代子孫值得一讀再讀的不朽政治巨著，就是一般人所謂「經典（Classic）」之作。根據牛津英文字典對「經典」一字所下的定義，經典本身自成一類，它是被大家公認為最卓越的第一流作品。在傑米羅看來，自古代希臘以來約兩千五百年中，某些政治理論的作品在洞察的深度，概念的光度，想像的新鮮度，及思考的品質等各方面，都非常突出而普遍被付以「經典」的名稱。被傑氏列入經典名單的政治理論作品包括：Plato's Republic and Laws, Aristotle's Ethis and Politics, Angustine's City of God,

Aquina's Treatises on Law in the Summa Theologica, Machiavelli's Prince and Discourses, Hobbes's Leviathan, Locke's Second Treatise,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arx's Philosophic-Economic Manuscripts and German Ideology. (Germino, 1975 : 237)。傑米羅當然並不認為這是一份完整的名單，他知道許多研究政治理論史的學者會把Jean Bodin, David Hume, Montesquieu, John Stuart Mill的作品包括在內；另有些學者還會增加Federalist Papers, James Harrington's Oceana, Richard Hooker's Law of Ecclesiastical of Polity and Vico in New Science。傑氏沒有把馬克斯以後的作者列入經典名單之內的理由很簡單：想要知道那一些馬氏以後或當代的作品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是極度困難的事。(Germino, 1975 : 276)就傑氏自己的名單而言，他承認在其中的不同作者之間並無實質內容上的一致，使他們連在一齊的不是他們所達成的結論，而是他們所提出的問題。在傑氏看來，他們都提出了三種共同的主要問題：即甚麼是人？甚麼是社會？甚麼是歷史？(Germino, 1975 : 237-238)

根據另一位當代研究政治理論史的名學者海克爾 (Andrew Hacker) 的看法，能留下經得起歷史長期考驗的「巨著」 (great looks) 的偉大政治理論家不會超過二十或二十五位。(Hacher, 1963 : 8)海氏個人特別重視者為：Plato, Aristotle, St. Thomas Aquinas, Niccolo Machiavelli, Thomas Hobbes, John Locke, Jean-Jacques Rousseau, Edmund Burke, Jeremy Bentham, G.W.F.Hegel, Karl Marx, John Stuart Mill等人。為甚麼海克爾特別重視這些偉大政治理論家留下的巨著呢？因為它們所討論的都是永恆性的政治問題，包括：甚麼是正義？公民應何時服從國家？人人都平等嗎？甚麼使權威具有正當性？何謂自由？人性是善良或邪惡？自治可能嗎？有無歷史法則？社會或個人何者優先？這些永恆的基本政治問題是超越時間與跨越國界的，不是每一時代都能產生這種偉人與巨著。(Hacher, 1963 : 8-9)

有兩位編輯從柏拉圖到盧梭的政治經典指南的編著，在該書的緒言裡，就這些在不同時代產生而具有不同面貌的政治經典著作，提出了三個問題：

是甚麼使這些著作連結在一起？為甚麼它們被稱為「經典」？何以今日的學生仍應閱讀這些舊書？那兩位編者是從他們所選擇的經典著作的本身去尋找答案，他們所找出的答案是：一些書之所以成為「經典」，不是因為某些在時間上距離遙遠的學者判定它們已通過某些試驗，而是因為它們自己成功的超越時代並對後代的心靈產生刺激，而其他的書則不能如此；如果它們能繼續如此，它們便繼續成為經典；如果它們變成不能理解或只有古董的價值，它們便失去經典的身份或地位。（Forsyth and Keens-soper, 1988：2）就兩位編者所選出的七本書而言¹，不管它們之間的差距多大，它們都是針對一項和人類存在相連的事實——統治或政府的事實。這種事實雖然是自明的，但卻不能自我解釋，需要有人用理性去加以詮釋才有意義。那七本書之所以有持久的價值，就是因為它們成功的將統治或政府的事實合理的和人類的性質及目的連結在一起。（Forsyth and Keens-soper, 1988：3）

如果有人唱反調的說：這些經典巨著只有透過它們自己的時代去詮釋才能加以理解；它們只是歷史作品而非哲學作品；它們所闡明的並非一般而只是特殊的狀況。如果這種說法只是提醒我們：那些作者所居住的世界顯然不同於我們的世界；他們常因受到當時嚴重問題的刺激而寫作；他們所用的言詞自他們所處時代以來已改變了意義；則那兩位編者對這種說法並無異議。但是如果那種說法的意思是：研究經典巨著的目的完全只是為了顯示它們如何被寫作的時代所影響及塑造，以及了解它們如何回過頭去影響它們所處的時代；則那種說法在他們看來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他們所選擇的七本書的最大成就，不在於它們對歷史事件所立即產生的影響力；而在於能使後人在歷史事件發生很久以後，仍會去思考它的那種激發力。為甚麼柏拉圖的共和國能激勵兩千年後的盧梭的寫作呢？因為從柏拉圖連接統治的永久事實和人類性質及目的之努力中，盧梭獲得了幫助他自己作同樣努力的啟示。因此在

1. 兩位編者所選出的七本政治經典巨著是：柏拉圖的《共和國》，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奧古斯丁的《上帝的城邦》，馬基維尼的《君道》，霍布斯的《巨靈》，洛克的《政府次論》，及盧梭的《社會契約》。

那兩位編者看來，政治哲學上的經典巨著之所以達成他們的地位，是因為它們之探測人類政治困境最為深刻；就是因為這樣，它們提供了我們今日從中獲取解決我們自己政治困境答案的最佳出發點；把它們看成只含有對當前政策問題提供良方是最愚不可及之事，因為它們所關切的乃是關於政治體制的性質及正當秩序的更大問題。（Forsyth and Keens-soper, 1988：4）

不僅某單一特定經典巨著中的論點能刺激後代的心智，兩位編者更進而認為：在經典巨著的作者自己之間的對話，他們彼此互相獲得的思想，以及他們對中心問題論點的交會及分歧，更增加了刺激後人思想的源泉，或更增加了留給後代的遺產。換句話說，我們後人不僅必須避免將經典巨著貶降為只是過去某一特定時代的歷史文獻；更須把政治哲學史視為具有無限價值的研究園地而加以開發，因為這種歷史是在過去偉大政治哲學家之間，透過他們的語言及思想而進行的哲學推理。（Forsyth and Keens-soper, 1988：4）

此外，兩位編者認為在他們所選擇不同時代的七本經典巨著之間，有許多持續性的議題連繫其間。他們特別列舉出四個議題為例加以說明²，這些例證言外之意所想說明者，無非是在經典巨著之間存有一種傳統，此一傳統含有持續性的議題，那些議題是政治哲學史上永恆的議題。

2. 第一個議題是柏拉圖的基本假定：政治秩序使人的心靈成份更顯得鮮明突出。換言之，人類能從較廣大的政治秩序看見他們自己個人慾望，精神及理性的複製。這種把國家看成「巨人」的觀點不僅在政治哲學中，也在該書所選作者之間一再重視，它能從霍布斯及盧梭兩人的理論中發現。不過有趣的不只是這種比喻的延續，也是其間的差異。第二個議題是關於表現在古代共和國的「公民社會」觀念的變化。這個觀念是亞里斯多德所提出並加以徹底的檢討；柏拉圖早已批評過這個觀念；聖奧古斯丁也貶降或看輕它；馬基維尼則表示對它的愛慕；但是霍布斯心裡卻根本沒有它的存在；洛克卻指出通往一個不同於古代觀念的新的「公民社會」；盧梭則不理霍布斯及洛克所隱含的新秩序，乃用自己獨特的方式恢復古代共和的精神。第三個議題最有興趣且最有深度，那是一個以不同方式，經歷數世紀之久，一再重現於兩種政治哲學家之間的鮮明對照。一種政治哲學家努力將政治秩序加以約束，使它受制於更高的絕對及永恆的正直道德世界。另一種政治哲學家則堅持政治秩序須關切人類共存的現實實際世界，任何欲實現絕對道德價值的企圖都會毀滅這種存在。第四個議題因為第三個議題而突現其重要性，這個議題是人類是否可能知道絕對及超越的道德真理？或人類的知識是否必須是有限及相對的？（

Forsyth and Keens-soper, 1988：5-6）

其實政治哲學本身就是一種傳統，這種傳統不僅含有持續性的議題，更有討論議題的持續方式。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史家瓦林（Sheldon S. Wolin）教授的名著《政治與看法：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延續與創新》一書，就是把政治哲學看成是一種特殊的論述傳統。該書的目的就是要討論政治哲學傳統的一般特性，建立該傳統的政治哲學家的不同關注，及顯示該傳統發展主線的變遷。（Wolin, 1960：1）不過瓦林不擬替政治哲學下一定義，一則簡短數語不能完全全書的意圖；再則政治哲學無永恆的本質，乃複雜的活動，非單一哲學家及單一時代所能完全加以界定；了解它的最好方法是分析從事政治哲學的大師的許多方式。（Wolin, 1960：1-2）雖然瓦林不能將政治哲學化約成一簡短定義，但是他能說明政治哲學不同於其他研究的特徵，那些特徵包括：政治哲學和哲學的關係，作為一種活動的政治哲學的特徵，它的題材與語言，看法的角度及傳統運作的方式等。（Wolin, 1960：2）

在了解政治哲學傳統方面，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它的題材及討論方式。瓦林對政治經典巨著大略檢視的結果，發現有許多問題不斷的出現在其中，譬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權威的性質，由社會衝突所引起的問題，某些政治行動目的之性質，及政治知識的特性等。在瓦林看來，雖然沒有一位政治哲學家對一切相關問題都同樣有興趣，但是他們對鑑定問題具有充分而廣注的共識這一點，足以證明他們所相信延續的關注的確存在；雖然政治哲學家之間常對問題的解決方案各不相同，但是這並不致於懷疑到共同題材的存在，最重要的不是反應的一致，而是關注的延續。（Wolin, 1960：3）

在瓦林看來，雖然政治哲學家對於政治題材具有自由的想像空間（Wolin, 1960：17-21），但是其想像的自由絕非毫無限制，最大的限制莫過於政治哲學本身的傳統。當政治哲學家從事哲學活動而進入辯論時，其措詞早已預先設定，因為過去的政治哲學家已蒐集並且系統化政治討論所用的語言與概念。他們所蒐集的語言及概念經過長時期的改進與傳播而成為文化的遺產，那些概念經過教導與討論，思考與改變，終於成為後代繼承的知識。當它們代代相傳時，它們成為特定政治哲學家的政治理論中的保守作用，保

存了過去的見解與經驗，並且強迫那些參加西方政治對話的參與者遵守某些傳統規則及慣例。即使像霍布斯，邊沁及馬克斯等叛逆者也被迫接受傳統中的大部份，以致於既未能毀滅該傳統，也未能將它置於全新的基礎上，只不過將它擴大而已。（Wolin, 1960：22）

就在瓦林一方面重視政治哲學史上傳統的同時，另一方面他並未忽視其中的創新。在他看來，從稍不同於舊角度的新角度看共同的政治經驗，用新的方式提出舊的問題，以及反抗思想與語言的保守趨勢，能幫助一特定政治哲學家擺脫現有思考方式，並促使其同代及後代人有必要重新思考政治經驗。正如歷史永不會完全重演一樣，某一時代的政治經驗也永不會和另一時代的政治經驗完全一樣，在政治概念和轉變中的政治經驗之間相互作用之際，政治哲學的概念及類別必然有所修正。這部份的解釋了為甚麼我們常會發現在不同時代的兩位政治理論家，雖然應用同一的概念，但意義卻大不相同，乃各自對一同現象的反應，結果每一重要的政治理論都同時具有傳統性及獨特性。（Wolin, 1960：23-24, 25）

政治哲學中的創新部份使瓦林對西方政治哲傳統有更進一步的詮釋。根據他的詮釋，大多數的正式政治思想都同時在兩不同層次運作：在某一層次上，每一位政治哲學家都關心他所認為是當時重大的問題，沒有一位政治哲學家只完全關心過去與未來，否則將付出不能被理解的代價；在另一層次上，許多政治哲學家的目的是超越現在，希望能對西方政治哲學中的不斷對話有所貢獻，這解釋了為甚麼某些政治哲學家常耗時費力去和過世很久的古人打交道，但是他們的貢獻方式是在不推翻整個傳統的前提下對傳統上的錯誤加以改正。就此意義而言，當某一位政治哲學家表面上看正在全神關注當前的特殊問題時，他並未完全抹殺過去，而是重新捕捉過去，結果是不同成份的共存：部份承舊，部份創新；舊的部份注入新的部份，新的部份被舊的部份影響。因此，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呈現兩種相反的矛盾趨勢：一種趨勢朝向不斷的後退至過去；另一種趨勢朝向爭取新的見解。（Wolin, 1960：25-26）

明乎此，我們便不難了解何以瓦林一本研究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的書，會冠以“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延續與創新”的次標題了。瓦林以上的詮釋或許不只

是他個人獨特的見解，或許更代表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之間的基本共識。

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性質

克特勃（George Kateb）教授於一九六八年出版了一本關於政治理論的書，書名為《政治理論：其性質與用途》。從書名的次標題可知此書的兩大研究重點：一為政治理論的性質，一為政治理論的用途。克氏所欲研究的政治理論就是本文所指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關於這一點他有很明白的宣示。在該書的前言裡一開始他便指出：雖然研究政治理論有很多方式，但是該書所探討的問題與答案都是政治理論家在傳統上所提出與解答者。（Kateb：vii）在該書第一章一開始克氏便指明：政治理論在傳統上乃指從廣泛道德觀點討論政治的著作；那些著作乃是政治理論史中的「經典（Classical texts）」或「巨著（great books）」；也是現在大學中大學生及研究生的政治理論課程中的讀物；那些著作雖然大部份很古老，但都是從事道德上的追求而和人類的重大關懷密切相連。（Kateb, 1968：1）

根據克特勃的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主要共有四種共同的基本特性：意圖上的道德性，範圍上的總括性，程序上的哲學性，及相關上的一般性。（Kateb, 1968：4-5）先就第一種特性而言，一切撰寫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作者，他們對政治的興趣或著迷從始至終都是道德的：他們努力說服或轉變他人接受某種合於道德的政治態度，或從事某種合於道德的政治事業。許多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目的在於改良政治生活，也有少數理論家的目的在於完全改造它。無論如何，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都是以價值為中心。表面上看，有些經典巨著似乎與此相反。譬如馬基維尼的《君道》似乎全書都在冷酷的教讀者如何奪取及行使權力的技術，一直到最後才爆發出拯救意大利的熱情。雖然註書最後幾頁與全書的內容不一致，其誠意多次受到質疑；但是即使沒有那幾頁，我們仍可看出有一種道德意識貫穿全書：他喜厭分明，喜歡

在政治事務上男子漢大丈夫氣慨的表現；討厭那些無原無故表現殘酷的惡徒。此外，貫穿全書的是他對基督教的良心不適於政治上的目的與手段的警覺。霍布斯的情形也是一樣，在面對他所想要敘述的政治現象，他自以為是客觀的觀察者，對於人性的邪惡犯罪他不會在乎，他會忠實的記錄人類必然的傾向，他只會從自然的事實得出不可避免的結論。然而他在《巨靈》一書中處處都在下判斷，提出實踐上的主張，討論何者可能，其間還帶有嘲笑及失望。總之，在克特勃看來，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作者都有道德的目的，連接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問題都一律是：政府應該替甚麼目的服務？（Kateb, 1968：2-3）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第二基本特性是它在內容範圍上的廣包性，因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興趣所在是整個政治體系。雖然他們或許會注意特殊的道德難題，或注意政治實踐上的細節，但是他們的志願遠大於此。雖然後人記得他們主要是因為某些觀點，某些建議或某些解決問題的方案，但是他們並不以部份為滿足。他們的作品是想要提供關於政府的完整學說，討論政治生活主要特徵的建議組成一龐大實踐方案，作為同答下列一連串問題的完整答案：政府既然為某特定目的服務，則替那些目的服務的政府必須是甚麼？它必須如何組織？它應有何種權力？它應替自己定下何種功能？它應尊重何種限制？誰有資格統治或裁判或動武或投票？當然，不同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有不同的重點和不同的選擇。（Kateb, 1968：3）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第三基本特性是它之所以常被稱為「政治哲學」的哲學性。政治哲學所指的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其從事的事業中，沉思明顯的事實，提出基本的問題，將很多被視為當然或已獲解決的事加以嚴密的檢查。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給予的答案未必都是批判的，徹底的，激進的或新奇的。如果他是保守的政治理論家，雖然他會維護現行政治世界的完整，但是就是因為他是政治理論家，他絕不會完全停留在普通意見的限制裡，他也會煽風點火而引起反應。無論如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會在人類的必然性中追溯政治生活的根源，會尋找或界定應支配政治論述的第一原則，

會找出生活的政治面和生活的其他面之間的關係。他之所以是一位理論家，就是因為他相信如果他的答案想要和別的答案競爭而能說服他人，他就必須面對很多難題，找出其中很多的關係，並且不厭其詳的加以清楚的說明。不管他的最後看法是甚麼，他開始時必須認定：政治是有問題的，它的方法在道德上是可以質疑的。克特勃在此處特別聲明：當他認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思想具有哲學習慣時，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一政治理論家都必須從含蓋一切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得出他的政治理論來——有人的確如此，有人則並非如此；他的意思也不是說每一位政治理論家都渴望有一蓋括一切的形而上學體系，並把他的政治理論看成是完成那種體系的必要貢獻——有人的確如此，有人則並非如；克特勃在此處所謂的「哲學」只指哲學家心智上的思考程序而已。（Kateb, 1968：3-4）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第四基本特性是它的一般或普通性。有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想要他們的著作能在當前或最近的將來對周圍世界達成特定效果；有些則比較超然，比較不大期望他們的著作會對真實世界產生立即的影響。不管怎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絕不會讓他們及他們的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即使是緊急迫切的問題）耗盡他們的興趣，因為吸引他們注意而使他們發生興趣的不只是他們當時當地的政治，更是政治的本身，政治的本身當然超越當時當地的政治，而是一般的政治。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一般政治的考慮，他們對一般政治的論證，他們所用的一般政治概念，他們從一般政治所得到的知識，以及他們所想要傳播的一般政治知識，這一切的一切即使不是完全不受時間限制，至少也是持久而不衰。他們的著作的持久意義不只是可供後人欣賞，更重要的是能對後人有用處。（Kateb, 1968：4）

總之，從Plato's Republic, Aristotle's Politics, Cicero's Law, Marsilius' The Defender of Peace, Bodin's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 Machiavelli's The Prince, Hobbes' Leviathan, Locke's Two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Rousseau's The Social Contract,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Mill's On Liberty and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等一系列經典政治巨著中，

克特勃教授發現了把它們連結在一起，使它們能有資格成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乃是一種對政治生活的研究；這種研究的企圖是道德或規範的，範圍是廣泛的，程序是哲學的，關連是一般的。（Kateb, 1968：4-5）

傑米羅（Dante Germino）教授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共同特性的了解與說明，雖然和克特勃教授的了解與說明不十分相同，但是在作者看來，兩者有互補的作用，在介紹完了克氏的看法之後，也值得介紹傑氏的看法。根據傑氏的看法，從柏拉圖開始至黑格爾為止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都具有六種共同特性，它們分別是：超越時空的開放態度；了解真象的企圖心；以普遍及永恆的問題為焦點；淡化典範的現實主義；承認知識限度的謙虛態度；及知識上的誠實無欺。茲分別一一進一步介紹如下。

第一、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知道經驗有不同的層次，也知道他可能在他所處時代之外取得超然觀察的立足點。他的心胸是開放的，因此他有能力超越當代政治鬥爭及其所涉及的立即問題，然後去發現其他問題及其相關性。如此開放的結果使他與當代世界的實際政治活動維持能加以批判的距離，開放也會使他和他的環境之間產生緊張關係。作為一個批判者，他既不反對崇拜偶像，也不自大自滿。他對現行政治體制的忠誠，並不能被對理論真理的忠誠所取代，除非現行政治體制腐化到無可救藥，否則他對它的忠誠依舊。而且兩種忠誠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無法解決：一方面他是特定國家的公民，必須對國家守法盡忠；另一方面他又是裁判國家的哲學家，必須忠於政治的真理。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便是在這兩難的困境中作了犧牲生命的選擇。（Germino, 1967：37）

第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研究真象的目的，在於了解而非操縱它。他有能力作此分辨，故在創造概念以觀察及參與真象時，不會使真象合於自己的意志，只會調整概念使其能充分合於真象。在這方面沒有人能完全成功，因此追求更充分的概念是永無休止的追求。但是如果不追求此目的，真正的政治理論便永無希望達成。正如一切理論上的研究一樣，政治理論認定有一獨立於研究他的人類心靈之外的政治真象結構存在，有待他去觀察及了解。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常須努力抗拒人類一種自然的本能衝動：即將其自己的私慾強加於真象之上，並用它來界定真象。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不同，意識形態家接受人類那種自然的本能衝動，順乎自然的用它自己所創造的形象，去重新改造人類的狀況；伴隨這種企圖常是一種人類權力無限擴張的狂喜感覺。但是意識形態家事實上，就像柏拉圖筆下的暴君，乃是一切人類中最受其幻想奴役的人；在他支配他人的慾望中，他事實上是最受支配的人。（Germino, 1967：38）

第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下列各問題尋求至少局部的答案：甚麼是人？需要那一種社會才能使人性充分發展？甚麼是合於個人及社會的正當秩序原則？這些都是人之所以為人而非特定時間與地方的人所遭遇到的普遍問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分析的對象，就是這些普遍及永恆的問題，而非當時立即及迫切的爭論。政論家則不同，他們關心眼前立即及實際的問題，把人類在社會生活的目的那種重大的基本問題則視為當然；即使偶而因好奇而觸及，但絕不會加以深究。然而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正當秩序問題，則正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最關心而予以深究者。過去很久以前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作品，在今日閱讀起來，就好像我們當代的作品一樣，原因無他，就是因為它們所談的中心問題，是人之所以為人在社會上所遭遇到的最基本問題。（Germino, 1967：38-39）

在傑米羅教授的心目中，Jeremy Bentham, Dante, Marrilius of Padava, Jean Bodin, James Harrington, Edmuond Burke, Joseph de Maistre等雖然各氣不小，但是都是政論家而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邊沁武斷的視快樂為最高的善而未加以批判性的思考，他是有效的社會改革者，卻不是優秀的道德理論家。但丁、馬西尼阿士及布丹等人的思想都是實際取向，欲強化他們分別維護的帝國或民族王朝。哈里頓的著作只想醫治英國憲政上慢性的疾病。貝克及梅斯特則是在啟蒙思想及法國大革命的衝擊之下，挺身而出替舊的政治秩序辯護，只是反革命的保守主義者。上述政論家雖然也有關於人與社群關係及歷史的意義等一般論點，但是由於他們濃厚的黨派色彩，那些論點在理

論上的價值與貢獻因而大為降低。反之，Augustin, Hooker, Thomas Aquinas, Machiavelli, Hobbes等則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雖然奧古斯丁與霍克在他們的主要作品中，是從眼前實際的問題開始；但是他們很快就離開它們而集中焦點於永恆問題的探討。霍克在其主要著作中，雖然也曾替伊里莎百王朝所建立的教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辯護；但是對這個實際問題他並沒有花多少篇幅在上面，甚至在還沒有完成它之前就轉移到永久性的問題了。阿揆拉斯對於教皇在世務事務方面的權力之類的熱門問題，更只是稍微觸及，點到為止；他的分析重點乃是置於諸如自然法及公善等理論問題上。馬基維尼雖然對當時的事務很有興趣，且介入其深；但是他寫君道一書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他關於政治所知道及所學到的一切完全表達出來；他是一個超越時代的政治理論家，絕不是只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政論家。霍布斯寫《巨靈》一書，雖然起源於當時政治秩序的混亂；但是他明示他寫該書的目的，是要提出一不受時間限止的政治學說。（Germino, 1967：39-41）

第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知道不宜把他們關於良好社會的模式直接強加於具體歷史情勢之上。他們的心態或性向其實是經驗取向而非先驗取向。他們知道他們的理論典範乃是分析及批判的標準，而非可由社會工程師實現的藍圖。他們知道烏托邦思想家所不知道的事：人性不能藉改變制度而改變，譬如不能藉消滅私有財產制而消滅人性的自私，制度必須適應特殊的環境。自從柏拉圖以來，沖淡典範便一直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關注的問題，不過此問題的重點因理論家的典範模式之「高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柏拉圖或盧梭最初設計的理論典範太高，因此他們須加以大幅度的劇烈修正。馬基維尼或霍布斯因為在開始設計其理論典範時，便已考慮到人性中的對立成份及一般形勢中迫切的需要，早已降低了其高度，因此不需大事更動。不管在那一種情形，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於由理論至實踐過程所涉及的困難，絕非茫然無知，均有自知之明。對於人類的權力來說，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都是現實主義者，敘述權力的真象只不過是他們替他們所擬想的批判性政治學的任务之一而已，不過這會引導他們用他們在人性中所發現維持有秩序生存

潛力更完全的現實主義去評估權力的真象。(Germino, 1967 : 41-42)

第五、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追求知識上，絕不自我封閉，絕不自命完整無缺，絕不自以為無所不知，絕不認為一勞就可永逸。他們並未建構一密不通風，無懈可擊的體系；他們用批判的方式研究人類在社會生活方面的永久性問題。那些以神為中心的古典政治哲學家及基督教裡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最深刻了解人類知識的不可避免的限度。柏拉圖的共和國，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以及阿揆拉斯與霍克的著作，雖然對問題都有批判性的精細探討，但是這些作品都不自認為已提供人類生活各方面的確實知識，都開放給進一步的修正與發展。這些作者都從已知的合理推論至人類存在及知識的基礎，他們都經驗到有限的人類心智不能理解最後的超越實在。至於那些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也是如此，他們並不假裝在他們的教義裡提出真象的全貌。雖然馬基維尼，霍布斯及盧梭轉變方向去考慮世界以內的存在，而未將這些存在和超越的基礎連結在一起；但是他們並未武斷的否定超越存在的真象。馬基維尼承認自己並非超自然事物的專家；霍布斯也有同樣的保留，承認個人內心深處的慾望不在自己視界範圍之內。沒有一位現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宣稱已把一切真象置於一體系之內，不再遺留任何神祕，不再有任何還需要進一步加以探討與解釋者。黑格爾初看之下，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大家都說他傲慢的宣稱自己已達哲學史的顛峰。在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他的確最接近走險至虛構一無所不包的總體系。其實黑格爾卻是謙虛的典型，因為他雙重的拒絕教導國家應何為及預測歷史走向的途徑。哲學對黑格爾來說是回顧的，雖然他未如此明言，但其教義的邏輯確似如此：當世界史繼續展現時，它需要未來的黑格爾在事實之後詮釋其意義；哲學的本身是永無結束的工作。(Germino, 1967 : 42-43)

第六、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特別關心根除自欺，偽善之言，及對不便與不適真象之置之不理。他們不會對讀者不願聽之事實塗上甜言蜜語，也不會不顧事實而作不可能實現的承語及預言。這樣努力去暴露自己或當代或繼承自過去的偏見，會使他們不受歡迎而且常被誤解。雖然沒有一位傳統經典政

治理論家未能面對立法者所必須考慮的人性黑暗面；但是馬基維尼特別坦白直言行使權力常涉及到的暴力，欺詐及自私等，因而惹上迄今仍揮之不去的惡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並非無錯，但是經由我們對他們的作品的研究，我們在對付自己的自欺及錯誤時，我們會受益良多：因為他們所遺留給我們的不是便宜及容易的解決方案；而且他們拒絕接受誘惑，藉虛構一沒有限制，沒有矛盾，沒有缺憾，沒有不確定及沒有意外的人類狀況的藍圖，以欺騙自己及人類。（Germino, 1967：44）

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

海克爾（Andrew Hacker）教授在其《政治理論：哲學，意識形態，科學》一書第一章第一節裡，從哲學，科學與意識形態的不同角度對政治理論在目的上的區分與澄清，頗有助於我們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所在。海氏從目的上把政治理論分成三種。第一種是政治科學家的政治理論，這種理論的目的在於敘述及解釋政治行為的真象。科學的政治理論家企圖對國家與公民的實際關係及對權力在社會的角色提出一般性的命題，他們的目的是要對政治人及政治制度的行為提出一般性的敘述與解釋。第二種是政治哲學家的政治理論，這種理論的目的在於建議公民，國家與社會應追求的目標。哲學家的政治理論的目是要對政治生活中的正當行為及對權力的正當使用作一般性的建議；換言之，他們的目的是要對國家與公民應遵守的一般行為規則提出建議。第三種是政策科學家的政治理論，這種理論的目的不是像第二種理論一樣，對政治的目的作一般原則性的建議；而是對達成政治目的之方法作特殊技術性的建議。（Hacker, 1961：1-4）

在海克爾看來，不管是那一種政治理論，都必須和意識形態分開。政治理論超然於利益之外；科學的政治理論只敘述與解釋政治真象，而不對所敘述與解釋之真象作明示或暗示的判斷；哲學的政治理論所建議的行為規則是為了確保社會上的一切人的良好生活，而不是只為了某些個人或階級的利益

。總之，政治理論家自己對任何國家或階級或政黨的政治安排，都沒有個人利益牽涉其中，因為沒有利益的存在，他對真象的認知及他對良好生活的想像才不會受到蒙蔽。意識形態則不同，它的意圖是要對特定的社會權力體系加以合理化。意識形態家心懷利益，他的利益或許是維護現行的權力分配狀況，以維持既得利益；或許是以改革或革命之名批評現狀，希望從權力重新分配中獲得新的利益。（Hacker, 1961：4-5）

海克爾在對政治理論本身的區分及它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區分，特別強調兩點。第一，真正偉大的政治理論家既不是純粹的科學家，也不是純粹的哲學家；他必須同時是部份的科學家與部份的哲學家，否則他不可能對政治知識有持久的貢獻。當然，他可以根據自己的性向及興趣，在研究的時間及精力上作適合於自己輕重的分配。（Hacker, 1961：2）第二，在政治思想史上，絕大多數政治作家都難逃意識形態的支配，他們對政治真象的敘述與解釋其實是曲解，他們對政治安排所作的建議是利益取向的合理化，結果他們的作品在很短時間之內便被人遺忘。但是每一代也有極少數真正的政治理論家，能擺脫及超越意識形態的束縛，產生同時具有科學性與哲學性的政治理論，並且不斷地流傳於後世。（Hacker, 1961：5-6）

史培金斯（Komar A. Spragens）教授單只針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替我們提供了較海克爾教授更深入的說明。他在《了解政治理論》一書中所要我們了解的政治理論，只限於有些人所謂的「規範性」政治理論，或另一些人所講的「政治哲學」，或瓦林教授所說的「雄偉（epic）」理論。不管那一種名稱最適宜稱呼這種理論，史氏所研究的這種政治理論乃是像柏拉圖的《共和國》，霍布斯的《巨靈》，盧梭的《社會契約》等經典巨著中所含的那種理論。（Spragens：1）這種理論也就是本文所探討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根據史氏的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是對人類政治生活提供深刻及全面的看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企圖把政治納入一完整的視界中，從而讓其讀者對政治的全貌有所認識。他們尤其想要從人性及人類世界中其他特徵的背景中，觀察政治以了解政治。（Spragens：4）在史氏看來，這

種深刻及全面的看法同時是一種敘述及評價。

在敘述方面，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找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行動者，力量及結構，並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加以說明。譬如：馬克斯主義者的理論指出了它們所認為是政治程序的核心經濟力量及社會階級的模式；啟蒙時期自由主義者的理論所找出並加以說明的人類進步的推動力，是科學與知識的力量；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霍布斯，關於人類的熱情與野心對政治的影響，都提供了廣泛而深入的分析；邊沁及麥迪遜敘述並且詮釋立法及憲政機構對政治結果所扮演的角色。因此，任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核心，都是對人類嘈雜與沸騰的政治表象下面所進行的真象所作的廣泛的敘述性說明。（Spragens：4）

在評估方面，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裡面所描述的政治景觀，並不是空洞的中性景色；而是在其中有秩序，也有混亂；有勝利，也有悲劇；有壯觀的成就，也有可怕的失敗；有社群，也有鬥爭；有進步，也有退化。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在使我們看見政治全貌時，也使我們看到在我們自己的政治制度與政治行動中，甚麼具有破壞力或不足或愚昧或無理性。譬如：亞里斯多德指出不能適應一特定社會的文化的憲法很可能失敗；柏拉圖說明不受約束的情感在政治上多麼危險；霍布斯指示我們如果只顧追求眼前的慾望而不管它們可能產生的最後災難是多麼愚笨；馬克斯說明「崇拜商品」是如何的不合乎理性；麥迪遜告訴我們把政府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同一人手中是多麼草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使我們在首先創造政治的人類需要及限度的完整脈絡中觀看政治，等於提供我們判斷我們自己政治行為及政治安排是否明智的標準，也等於提供我們觀察我們在做甚麼以及做得如何的透視鏡。（Spragens：5）

從上述顯而易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不僅只有學術上的興趣，它們和我們日常所遭遇到的實際政治問題也高度相關。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從事寫作時，他們一部份原因雖然是為了滿足他們求知的慾望，一部份原因也是為了他們的讀者的實際利益。幾乎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都相信：如果我們聽從他們的訓示，我們的生活也就會過得更好。因此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

經典政治理論企圖使我們認識清楚政治世界，以便提供我們指導；它替我們畫出政治地圖，這種地圖告訴我們站在何處，並告訴我們那些路線會帶領我們去我們需要去的地方。（Spragens：5）有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認為只要我們注意他們的見解，我們就能克服社會生活中的衝突與挫折，並且創造會使我們滿意的完全和諧的社會。有些雖不如此樂觀，至少希望他們對政治的了解會幫助我們避免或減輕潛伏的政治災難。即使政治觀最暗淡的霍布斯，也覺得他能幫助我們避免「孤獨的，貧窮的，污穢的，野蠻的及短暫的」生活。（Spragens：5-6）

史培金斯特別舉霍布斯與柏拉圖為例，以說明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如何在其著作裡，借用視力或眼光的比喻，以說明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如何提供人類對有秩序的整體政治的看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就是要糾正大多數人看政治的缺點，因為那些缺點會帶來政治災難的後果。譬如人類會因為極度的近視而陷入政治災難；他們會因為專注於眼前立即的慾望及關切而不向前看，直至為時已晚；他們會因為專心追求個人的名望或財富而得不償失；他們會因為不顧最後的結果而一味的追求個人的需求，終至陷於內戰，叛亂，及毀滅性的政治暴動。糾正視力，使人類看得更廣及更遠，就能避免這些災難，這正是霍布斯在其名著《巨靈》裡的政治理論所希望達到的目的。他把他在該書的政治理論稱為「道德或公民的科學」，他寫道：「一切人都生而配備多度眼鏡（指他們的熱情及自愛而言），透過它每一筆細微的開銷看起來都很令人心疼而捨不得；但是卻沒有那些望遠鏡（指道德或公民科學而言）去看遠離他們周圍苦惱，沒有此開銷也不可能避免的事」。（Spragens：6）

柏拉圖在其西方政治理論史上第一部名著《共和國》裡，也不斷訴諸視力的比喻來說明其目的。他所看到的視力缺點，不同於霍布斯在人類政治困境底部所發現的近視。柏氏在該書虛構了有名的「洞穴寓言」來說明此問題。絕大多數人都像終身居住在洞裡的人一樣，他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洞裡牆壁上閃動的影像；他們因為從未見過白日的陽光，甚至不知道他們所看到的

只是影像。同理，我們因為沒有能力看見事物的真象究竟如何，我們創造並生活在政治的幻想世界裡。因為相信幻覺能和極度近視一樣危險，我們會盲目的跌入會毀滅我們的身體與心靈的政治混亂中。糾正這種視力上的缺點，不像配近視眼鏡以糾正近視那樣簡單。在柏拉圖看來，人類不僅必須能夠看遠，而且還須能夠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所需要的不是鏡片而是光明，配眼鏡是無濟於事的，他們需要重新完全調整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就霍布斯而言，提供遠見，政治理論就能達到其目的；就柏拉圖來說，政治理論所提供的看法必須帶來一種轉變。「正如一個人可以轉動他的身體，以便眼睛所看見的是光明而不是黑暗；他的整個心靈必須轉離變化中的世界，直至他的（心靈之）眼能思索真象及我們所謂善的崇高光輝」。（Spragens：6-7）

在史培金斯看來，當諸如霍布斯及柏拉圖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討論特殊細節時，他們之間的差異在很多方面不僅很大而且很深，他們所發出的聲音是對話與辯論而不是合唱。不過史氏認為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之間，由於對他們研究的方式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了解，這些了解能使他們跨越差距廣大的時間，空間與政治文化而彼此對話。他們會堅持「看見」政治世界的整體並非易事，因為一般人的看法常受限制且常被扭曲；而且這種不能看見政治的整體而了解政治，很是危險而且具有毀滅力，因此儘可能改善政治視力的缺點至為重要。在史氏看來，這正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任務所在。（Spragens：8）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究竟追求的是甚麼？他們要想知道的到底是甚麼？凡是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人，通常對此問題的結論是一致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研究甚麼是「良好的社會」。史培金斯特別以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權威史特勞斯（Leo Strauss）為例，以強調這種一致的結論。史特勞斯堅持政治哲學是「企圖真正知道政治事物的性質及正當或良好政治秩序的嚐試」。史培金斯認為史特勞斯對政治哲學所下的簡單定義，有助於我們了解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共同的目：去認識及說明甚麼使政治社會成為良好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的人類感到滿足，而不會有不安全或痛苦之感。

(Spragens : 9)

五、結 語

在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之間，對西方政治理論史上那些人
有資格進入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之列，並無一致的名單：有的名單人數較少
；有的名單人數較多。不過不管名單人數的多少，就與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史
上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比較而言，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總數不僅少得多
，甚至可以說稀少得寥寥無幾。這一點是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
之間最基本共識之一，雖然不是最重要的共識。作為他們之間最基本而又最
重要的共識包括兩點，這兩點足以充分說明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之所以構成「
經典」及所以形成「傳統」而自成一類政治理論的意義所在。

第一、任何時代廖若晨星的偉大政治理論家，雖然也和當代多如過江之
魚的一般政論家一樣，也對當代迫切的實際政治問題關心；但是不同於後者
只限於關心眼前短暫的實際政治問題，而且只為了個人或特定團體，階級或
國家的利益設想；前者只是以眼前迫切的實際政治問題為起點，然後超越時
代及跨越國界，為了全人類的福祉，去思考關於人，社會與政治的永恆及普
遍的基本問題。他們經過理性思考所產生的政治理論作品，無論在洞察的深
度，概念的明晰，想像的新鮮，及思考的邏輯等各方面，都是被公認為具有
第一流卓越的水準。這些作品之所以是值得後人一讀再讀的經典巨著，是因
為它們能不斷激發後人的心智，讓後人從中獲取解決各自時代政治困境的答
案的最佳起點。它們的價值在於永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永垂不朽。

第二、在不同時代經典政治理論家之間，存有一種對話的傳統：這種傳
統不僅含有持續性議題，更含有討論議題的持續方式。當他們進行對話時，
其措詞早經設定。他們的用語及概念是前人遺留的文化遺產；他們的經驗與
見解也形成傳統的規則與慣例，代代相傳，使參加對話者都必須遵守。當然

，後來者對於所繼承的傳統用語，傳統概念，傳統規則與傳統慣例，絕非盲目的接受與遵守；也會隨不同時代變化的經驗而加以適當的修正，因而突顯其創新的獨特貢獻；但是這種貢獻是在不推翻整個傳統的前提之下，對傳統上的錯誤所作的修正。總之，在經典政治理論中，基本上有兩種成份互動的並存：部份承舊，部份創新；舊的部份注入新的部份，新的部份受舊的部份影響。這就是傳統典政治理論中永遠不斷的延續與創新。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具有那些特性呢？在當代研究傳統經典理論的學者之間，有兩種不大相同但可以互補的看法值得注意。第一種看法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作品中，發現把它們連在一齊，使它們能有資格成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乃是一種對政治生活的研究，這種研究主要共有四種基本特性。第一是寫作意圖上的道德性：努力說服或轉變讀者接受某種合於道德的政治態度，或從事某種合於道德的政治事業。第二是內容範圍上的廣包性：以整個政治體系為研究的對象，提示關於政府的完整學說。第三是思考程序上的哲學性：沉思明顯的事實，提示基本的問題，將很多被視為當然或已獲解決的事加以嚴密的檢討。第四是著作的普遍相關性：超越當時當地政治，關心一般政治，其功效持久而不衰。

第二種看法是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身上找出了六種共同的特性。第一是超越時空的開放態度：他們在所處時代之外，取得超然觀察自己時代問題的立足點，以開放的心胸批判當代的實際政治活動，但仍維持對現行體制的忠誠。第二是了解真象的企圖心：他們研究真象的目的在於了解而非操縱它，故在創造概念以觀察及參與真象時，不會使真象合於自己的私慾與意念，只會調整概念以充分合於真象。第三是以普遍及永恆的問題為焦點：甚麼是人？需要那一種社會才能使人性充分發展？甚麼是合於個人及社會的正當秩序原則？這些是他們專注並尋求答案的普遍及永恆的問題。第四是淡化典範的現實主義：他們的性向是經驗而非先驗取向；他們知道理論典範乃是分析及批判的標準，而非可由社會工程師實現的藍圖；他們知道人性不能藉改變制度而改變，制度必須適應特殊的環境。總之，他們知道由理論至實踐過

程所涉及的困難，所以沖淡典範乃是他們現實主義的要求。第五是承認知識限度的謙虛態度：他們在追求知識上，從不自我封閉，絕不自命完整無缺，絕不自以為無所不知，絕不認為一勞就可以永逸。第六是知識上的誠實無欺：他們不會對讀者不願聽之事實塗上甜蜜言語，也不會不顧事實而作不可能實現的承諾及預言。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所追求的目的或肩負的任務究竟是甚麼呢？在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之中，有人從比較科學的政治理論，哲學的政治理論及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突顯它的目的；有人則單獨從它的本身去了解它獨特的任務。在採取比較角度的學者看來，科學的政治理論之目的在於敘述及解釋政治行為的真象：即對國家與公民的實際關係及對權力在社會上的實際行使，提示一般性的敘述與解釋。哲學的政治理論之目的在於建議公民與國家應追求的目標及應遵守的一般行為規則。意識形態的目的則是以利益為基礎，合理化或批評及改造現行社會的權力分配體系。根據這種比較，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在目的上顯然不同於意識形態，因為它已擺脫及超越了利益的束縛。另一方面它既不是純粹的科學性，也不是純粹的哲學性政治理論，而是兩者的結合；當然在結合中孰輕孰重，則因人而異。

在採取單一角度的學者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任務在於提供對人類政治生活深刻及全面的看法，這種看法同時是一種敘述及評價。在敘述方面，它找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行動者，力量及結構，並對它們之間的關係加以說明。在評估方面，它提供我們判斷我們自己政治行為及政治安排是否明智的標準，也提供我們觀察我們在做甚麼以及做得如何的透視鏡。總之，它企圖使我們認識清楚政治世界，以便提供我們指導；它替我們畫出政治地圖，這種地圖告訴我們站在何處，並告訴我們那些路線會帶領我們去我們需要去的地方。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為甚麼要提出對政治的深刻及全面的看法呢？一言以蔽之，其目的在於糾正大多數人看政治的近視或錯覺，使他們看得更廣，更遠及更清楚明白，以免短視或錯覺所帶來的政治災難。

無論是從比較的角度看，或是從單一的角度看，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

理論的學者都一致認為，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都是在追求一個共同的最後目的：去認識及說明甚麼能夠使政治社會成為良好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的人類感到滿足，而不會有不安全或痛苦之感。

以上本文所倚重的當代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學者對該類理倫在意義，性質及目的各方面的詮釋，雖然未必是能令人百分之百滿意的完全正確的詮釋，但是在作者個人看來，它們至少是能使人大體上接受的比較合理的詮釋。在我們已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認識其性質及明瞭其目的之後，緊接著我們進一步須問：這種理論是如何形成的？它達到那些結論？這將是作者計劃在不久之後的兩篇論文中所要解答的問題。其中一篇所要探討的主題將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另一篇所要分析的重心將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在結論方面的主要內容」。

參考書目

- Forsyth, Murray, and Maurice Keens-scoper, 1988, eds. A Guide to the Political Classics: Plato to Rousseau.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rmine, Dante., 1967, Beyond Ideology: The Rivival of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 Germine, Dante., 1975, "The Contemporay Relevance of the Classic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Political Science: Scope and Theory, edited by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Menol Park, California: Addison-Werley Publishing Company.
- Hacker, Andrew., 1961, Political Theory: Philosophy, Ideology, Scien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 Hacker, Andrew, 1963, The Study of Politics: The Western Tadition and

American Origin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s Company.

Kateb, George., 1968, Political Theory: Its Nature and Us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pragens, Thomas A., 1967,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trauss, Leo., 1959,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Wer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Wolin, Sheldon S., 1960, Politics and Vision: Continuity and Innovation in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A Summary of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Its Meaning, Nature and Purpose

Ren-Few Ku^o

The kind of political theory to be introduced in this essay is the earliest and the oldest one, i.e.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The introduction is limited to its meaning, nature and purpose and is based on interpretation made by contemporary scholars, which the author selects because of its being regarded as the most relevant and the most justifiable ones.

A political theory is called "classic" not merely because the depth of its insight, the clearness of its concepts, the freshness of its imagination, and the logicalness of its thought are all recognized as among the first class, but also because it can constantly inspire the mind of later generations who will obtain from it the best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olution of their own political predicaments. There has existed a tradition of dialogue among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ists in various times. It consists not only of persistent issues; but also of persistent ways to discuss them. Thus whoever participate in the dialogue are inevitably bound by traditional terms and concepts, traditional rules and customs, and must obey them. Late-comers can, of course, correct traditional errors without overthrow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whole tradition and thus refresh it so that its life can persist much longer.

From works of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we find moral quality in their intention; inclusive quality in their scope; philosophical quality in their procedure; and general quality in their releva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ists themselves we also discover their open mind transcending time and space; their intention to understand reality; their focus on general and permanent questions; their realism in diluting their paradigms; their intellectual honesty and integrity.

Comparatively, unlike ide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is unbound by specific interests and transcends over them;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ither pure scientific political theory (its Purpose being the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of actual political behaviors of both citizens and states) , nor pure philosophical political theory (its purpose being the prescription of aims which both citizens and states should pursue and general rules of conduct which they should obey) , but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Singulantly, the task of the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is to provide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vision of human political life (both descriptive and evaluative) for remedying defects in the ways that most people see politics (such as shortsightedness and illusion) so that they can see it broaderly, further and more clearly and thus can avoid political disasters brought about by shortsightedness and illusion. Comparatively or singularly, all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pursue a common and final aim: to know and to articulate what makes a political society a good one.

Keywords : Classics, Tradition,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Meaning, Nature and Aim, Perspective.